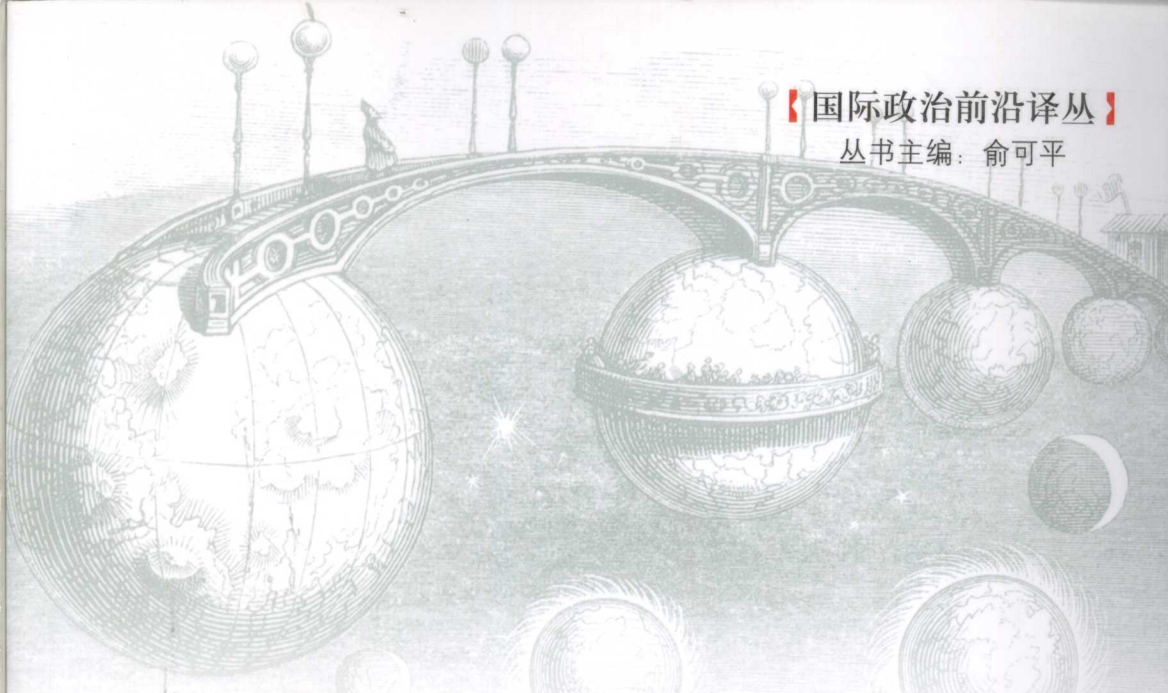




【国际政治前沿译丛】

丛书主编：俞可平

NO VIRTUE LIKE NECESSITY

Realist Though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ince Machiavelli

马基雅维利以来的 现实主义国际关系思想

〔英〕乔纳森·哈斯拉姆 (Jonathan Haslam) / 著
张振江 卢明华 / 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国际政治前沿译丛】

丛书主编：俞可平

马基雅维利以来的 现实主义国际关系思想

【英】乔纳森·哈斯拉姆 (Jonathan Haslam) / 著
张振江 卢明华 / 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章

图字:01-2006-3243

No Virtue Like Necessity: Realist Though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ince Machiavelli

Jonathan Haslam

© 2002 by Yale Universit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简体中文版由耶鲁大学出版社授权中央编译出版社在中国大陆独家出版发行。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基雅维利以来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思想/(英)哈斯拉姆著;张振江,卢明华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8

(国际政治前沿译丛)

ISBN 978-7-80211-898-0

I. 马… II. ①哈… ②张…③卢… III. 国际关系-政治思想史-世界 IV. D8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33455 号

马基雅维利以来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思想

出 版 人 和 龔

丛书执行 贾宇琰

责任编辑 贾宇琰

责任印制 尹 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100032)

电 话 (010)66509360(总编室) (010)66509350(编辑室)

(010)66161011(团购部) (010)66130345(网络销售)

(010)66509364(发行部) (010)66509618(读者服务部)

网 址 www.cctpbook.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溢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960 毫米 1/16

字 数 285 千字

印 张 22.5

版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9.00 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首席顾问律师 鲁哈达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66509618

编者说明

改革开放过程，也是中国加入国际社会，并在其中发挥越来越大作用的过程。胡锦涛在总结改革开放 30 年经验的时候，把中国参与全球化作为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经验之一。他说：“当代中国的前途命运已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需要中国。”中国要为促进人类和平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贡献。

编选这套“国际政治前沿译丛”的初衷就是，希望能为日益国际化、全球化的中国提供更加多样的国际政治知识的支持和参考。这个想法产生于 2004 年初夏俞可平教授与一位在剑桥大学留学的中国学者的谈话。双方谈到了国内对于国外的国际政治著作的引介工作，都认为不应该只把目光集中在个别国家，特别是美国，应该注意到其他国家中关于国际政治的著作，这样才能了解到更多的观点、思想，才能有所比较，并且汲取百家之长。这位中国学者回到剑桥后，就联系了一些英国学者为我们推荐了一批他们认为富有价值的著作。当然，其中多部是“英国学派”的代表性著作。我们又根据当时国内已经翻译的国际政治著作的情况，从这些著作中挑选出一些。现在，这些著作

将陆续与读者见面。

尽管这些著作的论题不同，但有三个共同特点：首先，这些著作都具有很强的理论性。有学者认为，英国学派最大的理论特色是他们主张用历史、法律、哲学的方法来“阐释”国际政治，而不是用需求对国际政治进行“解释”。从这些著作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国际政治不仅仅是实力政治，也是价值政治。其次，这些著作所讨论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建构国际体系、国际社会以及世界社会。围绕这些核心问题，不同学者分别从逻辑推演、历史分析角度进行了论证。这些都是大问题，需要大视野、大答案。这对于我们思考目前日益全球化的世界，非常具有启发意义。最后，这些著作在国外学术界乃至教学中，都具有良好的声誉。有的书已经再版多次，并且成为所在领域的权威性著作。借助这些书，我们可以更及时地了解国外国际政治理论的发展。

选译是一件痛苦而充满期待的工作。本套书从组织翻译到校译统稿，历经四年之久。译者有的已经离开北京到外地工作，有的到海外留学深造。翻译过程中也经历了多次反复，一些译者用很多时间与作者就具体的问题进行沟通交流，丛书编辑为了统稿校对花费了大量精力。令人欣慰的是，这些努力终于换来了沁人的书香。

随着世界格局的变化，特别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大国的崛起，国际政治正在经历着深刻的变革。“历史是过去的政治，政治则是现在的历史”。我们希望这些著作能为我们理解当前的国际政治提供历史和理论的借鉴，也希望我国的国际政治研究也能对人类文明作出自己的贡献。

我们根本不会去爬上自己的“罗西南多”^①，不会去纠正所有的错行，不会去碰世界上所有的风车。

——威廉·福克斯：《关涉法国战争的英国利益》

尽管有些人公开声言反对我的著作，但他们还是会理解我的。

——马洛：《马耳他的犹太人》

① Rozinante 是唐吉珂德给他的马起的名字。——译者注

致 谢

一部像这样内容广博的著作不可避免地是依赖于先前走过这条道路的其他学者多年来所奠定的基础。但本书目的不在于追逐时髦和对他人的综合研究进行一种不实用和非原创性的注解，作者旨在尽可能地到处挖掘原始材料。

所以，在此特别高兴表达我对那些慷慨分享他们对该话题的高见和那些花费时间去阅读和批评手稿内容者的感谢之情：罗伯特·W. 塔克（Robert Tucker）（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国际法与国际制度爱德华·伯苓讲座名誉教授）、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剑桥基督学院近现代史里基斯讲座教授）、亚当·罗伯茨（Adam Roberts）（牛津贝利奥尔学院国际关系蒙塔古·伯顿讲座教授）、恩斯特·哈斯（Ernst Haas）（加州大学伯克利政府学罗宾逊研究讲座名誉教授）、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Waltz）（加州大学伯克利政治科学福特讲座名誉教授）、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阿德莱·斯蒂文森讲座教授）、德里克·比尔斯（Derek Beales）（剑桥西德尼·苏塞克斯学院近现代欧洲史名誉教授）、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哈佛大学约翰·肯尼迪政府学院国际事务伊夫朗和简

妮·柯克帕特里克讲座教授)、吉乌利亚诺·普罗卡西 (Giuliano Procacci) (剑桥圣体学院法学教授)、迈克尔·S. 索南舍尔 (Micheal Sonenscher) (剑桥国王学院历史研究员) 和安德鲁·赫里尔 (Andrew Hurrell) (牛津纳菲尔德学院讲师与研究员)。

这里也一并感谢那些在我一个接一个的富有成效的学术休假期间安排我担任访问教授的人, 本研究的大部分和最终手稿都是在此期间完成的, 他们包括: (1994 年斯坦福) 国际史雷蒙德 A. 斯普朗斯讲座教授戴维·洛劳维 (David Holloway)、(1996 年耶鲁) 历史学 J. 理查德·森迪尔沃斯讲座教授保罗·肯尼迪 (Paul Kennedy) 以及 (2001 年哈佛) 安德鲁·莫拉维斯克 (Andrew Moravcsik) 教授, 还有 1998 年在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的研究人员, 尤其是热情宽宏的杰克·马特洛克 (Jack Matlock) 教授。

乔纳森·哈斯拉姆

剑桥大学圣体学院

| 目 录 |

致 谢	/ 1
导 论	/ 1
第一章 国家利益观	/ 23
第二章 均势观	/ 124
第三章 贸易平衡论	/ 176
第四章 地缘政治观	/ 222
第五章 从现实政治到新现实主义	/ 250
结 语 现实主义的重要性	/ 337

导 论

实际上，在关乎国家事务方面，根本没有必要去利用学术著作，因为它们太过繁琐，很可能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教皇克莱门特八世谏言，1595年8月26日^①

指出国际关系学术著作与政治家的实际需要之间没有什么相干并不令人吃惊，原因是双重的：一是实质问题，二是形式问题。

就实质而言，拒绝承认国家是国际关系问题的一个不间断的关键单位，使得很多研究显得多余。此外，坚持国与国之间的行为应当靠个人行为的道德准则加以制约，则更有力地削弱了学术成果的可信性。总之，就是因为缺乏一种较为宏大的现实主义，作为学术性学科的国际关系学被决策者丢弃了。

就形式而言，就是那种按照自然科学的模式把国际关系学转变成

^① *La Legazione di Roma di Paolo Paruta* (1592—1595), ed. G. de Leva (Venice 1887), Vol. 1, p. 268. 克莱门特八世是个出色的政治家。作为1592—1605年的教皇，他在西班牙和法国之间达成了和平，与此同时也拓展了罗马天主教的领地。

一门科学的努力使得国际关系学，从最坏处说，变得神秘而不可理解；从最好处说，导致抽象教条的泛化，有意无视思想的本源及其历史与文化特性。各种概念都得在它们产生与演化的具体情形中进行重新引介，以便剔除与我们时代和背景不相关的那些成分与联想。

因此，我们的目的也是双重的：重申现实主义方法的价值，但以一种激起我们意识到现实主义概念出现的语境的方式来付诸实施。只有这样，国际关系作为一门学科才能言之有物，才能在国家的最高层找到听众。对于反对现实主义的人而言，这不会有什么结果，因为如果国家不是主要行为体，那么国务活动家也就不是需要进言的最重要对象。

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的现代政治思想史的锋芒或许可以恰当地描述为是对自由的研究。^① 相比之下，下文也许可以同样称为对权势的研究，它针对三种截然不同的读者：决策者、政治思想爱好者以及国际关系学者。

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与负责对外政策操作的决策者之间的关系一直是问题丛生，或多或少是因为这是一个没有实际经验的人以据信的权威身份发表评论的少数几个领域之一。意大利人鲁道维科·朱科洛（Ludovico Zuccolo）在很久以前就发出抱怨：“没有出过海的人不会认为自己了解航海技术；不致力于音乐的人不会宣称自己懂得曲调和乐符。但是却有这样一些为数不多的人，尽管自己从来没有从政治国，却宣称知道如何评判国家与帝国的施政当局。”^② 实际上，这就是当今外交事务大臣在听完内阁冗长且常常谬误百出的讨论后所发出的典型牢骚，尽管有人指出这是为民主所付出的必要代价。

为了满足教育这些重要事务决策者的显而易见的迫切需要，近代

① Q. Skinner, *The Foundations of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 vol. 1 (Cambridge 1978).

② L. Zuccolo, *Della Ragione di State* (1621), p. 1: reprinted in ed. B. Croce and S. Caramella, *Scrittori d'Italia: Politici e Moralisti del Seicento* (Bari 1930), p. 25.

早期的欧洲涌现了来自塔西陀 (Tacitus)^① 一类古典大历史学家著作的政治格言录。吉罗拉摩·弗拉凯塔 (Girolamo Frachetta, 1558—1620) 是意大利反宗教改革时期一位有相当政治经验的人物, 他先为吕吉·德·埃斯 (Luigi d'Este) 和斯奇比昂·冈扎加 (Scipione Gonzaga) 两位红衣主教工作, 之后作为西班牙大使出使罗马教廷, 后逃离该都 (原因不明) 并在那不勒斯定居, 接着又成为厄毕诺公爵 (Duke of Urbino) 的代表。^② 在一本格言录的前言中, 他提出一件对君主来讲再重要不过的事情: 了解怎样治理国民以使其和平相处。“事关国家政府是处于和平还是战争状态的方法或技巧,” 他说, “君主常常通过三个渠道获得: 通过倾听熟悉此类事务者的口头传授; 通过阅读历史和关于国家与军事事务的著作; 以及通过实践的磨炼。”^③

尽管弗拉凯塔成功地大规模编纂了格言, 但他却公开承认通过这种方式来教授治国方略有局限性。首先, 他认为从我们赋予这个术语的意义上说, 这不是科学。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 社会科学不可能像数学一样加以精确说明。^④ 弗拉凯塔所说的“社会科学”这个词汇只不过是关于政治的知识或学问。第二, 无论进行什么样的培训, 人类心智的易犯错误性导致人们犯错。第三, 情绪常常胜过理性的判断; 最后, 上天总会让事情变得始料不及:

读者一定不能把它们 [这些格言] 视为必然, 不能将之等同于亘古不变的数学等式或天体运动, 而应当随时发现其错误, 因

① 对该问题的一个简单介绍, 参见 R. Mellor, *Tacitus* (New York 1993), Chap. 6, 进一步的详情见以下, pp. 37—38。

② T. Bozza, *Scrittori Politici Italiani dal 1550 al 1650: Saggio di bibliografia* (Rome 1949), p. 80.

③ G. Frachetta, *Il Seminario de' Governi di Stato et di Guerra* (Venice 1613), “Proemio”.

④ Aristotle, “Nicomachean Ethics”, Book 1: *Complete Works of Aristotle*, ed. J. Barnes, Vol. 2 (Princeton 1984), p. 1728.

为人类的无能心智常常在国家与战争的事务上产生错误意见，因为情绪常常蒙蔽判断，因为上帝的旨意，无论是由于人类的失误而惩罚一些人或者出于其他什么目的，常会让事情走向人类所希望的相反方向。^①

在评价通过国家格言的教育给统治者提供的好处方面，弗拉凯塔认为，“对统治国家和从事战争而言，构成政治科学和战争艺术的准则与规则是必需的。对于那些不依靠它们而有时治理不错的人”。他接着说：“人们会说这只不过是纯属偶然，或者他在一开始就从那些已经接受了这些科学与艺术的人那里得到了这些，或者他已经通过长期的经验形成了类似于科学的习惯。”^②

在提出了证明政治科学有用的理由之后，弗拉凯塔又对仅靠政治科学的训练就能产生称职的政治家持有怀疑：

实际上，君主和将军们不学科学，而是凭经验治国带兵或听从别人谏言进行统治……远比依靠跟治国理政没有关系的科学或者由第三方提供的统治与战争之术要好得多，因为学习与治国理政没有关系的学科无异于浪费时间。而通过第三方所传达给君主与将军们的信息只会徒增疑虑而非解决方案，在国事与战争当中，没有比缺乏果断更糟糕的事情了。除此之外，学到国事零星皮毛的君主又觉得他们已经全面了解了这些东西……^③

我们的目的不是要解决这种困境，也不是宣称学术著作一定会对事件的进程产生重大影响，不管它们已经多多少少产生了这样的影响；

① Frachetta, *Il Semonario*, p. 993.

② Ibid., p. 794.

③ Ibid.

任何试图测量其影响程度的努力都会变得极端复杂，当然从其自身来讲是值得的。然而，这里存在着一种联系，这就是观念的力量。批评美国对外扩张的自由主义者威廉·萨姆纳（William Sumner）在上个世纪之交写道：“让一种教条随意地存在于听众之中是危险的，并且这种危险会带来重大的影响……你们现在只是在你们对它的设想这一模糊限度内同意这一教条说法；明天人们用同一称谓来涵盖某些你们从未听到或想到过的内涵时，你们就会不得不同意它。如果你任由一个政治时髦话流传与发展，你会发现有一天在你醒来之时，它已经高高在上并成了你命运的裁定者，而你却对此毫无还手之力，就像人们面对幻觉时一样无力应对。”^① 萨姆纳指的是一定程度的意识。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有一段被广泛引用但又多遭缩减的文字谈到了无意识的力量：“无论正确与否，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观念都比人们通常理解的要强大得多。实际上，世界是被少数人统治的。注重实用的人自以为他们自己不受任何思想的影响，而实际上他们却常常是某个过世经济学家的奴隶。那些捕风捉影的掌权疯子们正在从几年前某个拙劣学术家那里摄取致使他们癫狂的精气。我肯定，相比观念的这种渐进式蚕食，既得利益集团的权力一定被大大夸张。诚然，不是马上，但在一定的时段之后；那些公务员、政治家甚至是鼓动者应用于实践的观念都不大可能是最新的，因为经济与政治哲学领域内超过 25 岁或 30 岁之后还受新理论影响的人并不多见，但是，不论怎样，最危险的迟早都是观念而不是既得利益。”^②

这种重观念而轻物质环境的古典自由主义论点未必具有值得认真对待的充分说服力。再者，影响也不是只分不同的时间，还有不同的

① W. Sumner, "War", 1903: *War and Other Essays* (New Haven 1919), p. 38.

② J. M. Keynes,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London 1964 edition), pp. 383-4.

形式。直接影响容易识别但却不多见，间接影响第一眼看上去似真但也可能太微妙而无法测定。一些学者认为自己即使不在知识方面也至少在判断方面是独立的，但仔细去读一下他们的著作并完整了解他们所处的时代，就会对他们自视当然的思想独立产生重大怀疑。换句话说，情况很可能是，决策者反映的是从学术界学来的东西。一位从事国际关系研究的美国教授坚持“世界的形态将取决于我们认为真的理论，我们所想所作会使之成真。”^① 无论对错，确定无疑的是，超乎学人自己所愿意承认的，学术研究常常反映着当权者的态度与假定。本书的写作正是基于认为上述这两个命题往往是正确的这种信念。

决策者必须要了解不成文前提假设的本源，这样才能避免被这些假设推向损害所求利益的境地。自然，头脑清醒是走向控制的第一步。这对大家都一样。只有认识到观念、当权者的利益以及主要的国际环境三者之间可能的相互依存，才能使我们在接受这些最纯粹形式的观念之前排除可能的偏向。那么，这些埋藏在知名大学图书馆稀有书库中的观念与指导我们当代对外政策的观念到底有多大程度的关联？先贤们似乎对这一问题相当肯定。古希腊将军修昔底德（Thucydides）在他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写道：“如果那些认为我的话有用的人是想清楚地了解那些发生在过去、且会以同样方式在不同时间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以同样方式再次重演（人性使然）”，那么他一定认为过去对现在有所教益，其基本原因在于不变的人性。^② 有人怀疑历史事件能否程度完全一致地重复。我们同时代的人艾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告诫不要“炫耀早期提出过的思想，无视它已经和现实之间发生的遭遇，这种遭遇常常不尽如人意……如果忘记了早先的

^① 布鲁斯·拉塞特写给《国际安全》杂志的信，参见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5, No. 3, Winter 1990/91, p. 217。

^② I, 22. 4; Thucydides,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ed. M. Finley (London 1972), p. 48.

思想事件，那么，两种不同或时间相距甚远的模糊雷同的环境就很可能导致相同或同样错误的思想与回应”。^①

弗拉凯塔提出了古代权威是否比近现代权威更值得尊重的问题。很多人认为近现代的权威有更大的分量，因为他们“离我们更近，所以也有更大的说服力”，而古代的国事，无论政府还是战争，“整体上讲都不同于当代”。^② 而且，近现代权威也更容易说服民众，因为民众“对古代不了解”；实际上，贵族之所知也好不了多少。但另一方面，他又提出，“无论政府形式还是从事战争的方式，今天的形势可能在某些方面与古代不同，这无关紧要，因为这些不同实际上微乎其微或者子虚乌有”。^③ 这才是我们在继续行文前需要考虑的问题。我们能够认定是切合的吗？我们只能认定部分切合？对我们来说，弗拉凯塔时代以来的对外政策行为是否比从塔西佗到弗拉凯塔时代有了更加实质性的变化？

为什么我们要认定重新发现国际关系思想的根源只对决策者和世界事务学者有价值？这个学科至少把两个主要的领域联系在了一起：国际关系理论和政治思想史。长期以来，这两个领域一直存在着鸿沟，直至今今天在某种程度上依然如此。朱塞普·费拉里（Giuseppe Ferrari）在他 1862 年《意大利的政治作家》（*Corso sugli Scrittori Politici Italiani*）中就发出抱怨：“意大利学派的错误，从远古时代到洛克（Locke）、孟德斯鸠（Montesquieu）直至当代的政治人物的所有学派的错误都是把这个学科局限于一个孤立的国家观，就好像这个国家在地球上只此一家。柏拉图（Plato）将他的理想国当成是孤立单一体，就像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认为他的国家就是世界，康帕内拉

① A. Hirschman, *The Passion and the Interests: Political Arguments for Capitalism before Its Triumph* (Princeton 1981), p. 133.

② Frachetta, *Il Seminario*, p. 993.

③ Ibid.

(Campanella) 的普世太阳城和孟德斯鸠的世俗君主国也都一概如此。”^①

实际上，或多或少在过去的 20 年里，从事政治思想史教学与写作的人也是一样。^② 在研究国内政治与致力于国际关系研究之间进行某种分工是必要的，因为它促进了更大程度的专业化。这样做也可以更深入地开发知识。但是，由此产生的危险是曲解，由于概念上的划分，这个学科被切割成两半，尽管它们原本是有机联系的。现在该是那些教授政治思想史的人关注国际关系的时候了，反之亦然。

主导政治思想史的老权威们的确提到了国际关系，即使绝非全面。他们给我们留下了零散的片段、不全的主张以及初始的概念。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从这些散论片言中探寻一种模式，对几个世纪以来的“现实主义传统”的著作进一步发掘，追寻国际关系思想的渊源，以便最终使近期流行的学理与争论置于选定的语境中。我们的发现是有趣的。我们发现一些特定的现实主义概念并不是一代接一代、一个世纪接一个世纪地衔接进展，而是间断性的起与伏、有时成为时代主导、有时让位于其竞争对手普世主义的兴衰沉浮。因而，很难断定后代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重新创造了或者重新发现了那些历史悠久的思想。

维多利亚时代的政治经济学家麦卡洛克 (MacCulloch) 认为这种情况发生在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发展的最早几个阶段：

那些在科学或文学各科里收集大量文献的人，或者那些下苦功夫追寻其历史的人，对于见诸早期开拓者的正确原则和学理几

^① G. Ferrari, *Corso sugli Scrittori Politici Italiani* (Milan 1862), p. 792. 但后来的哈佛的卡尔·弗里德里克 (Carl Friedrich) 的观点却十分不同：“内部安全与外部安全被无望地搅在了一起，这是……所有老一代学人的倾向，而且通常对事实没有任何明确的认识。” *Constitutional Reason of State: The Survival of the Constitutional Order* (Providence 1957), p. 2.

^② 当然，理查德·塔克 (Richard Tuck) 是个可敬的例外，特别参见 *The Rights of War and Peace: Political Thought and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from Grotius to Kant* (Oxford 1999)。